

005560

論文學教育

李廣田



創作書社

01
31

S 005560

論文學教育



李景宜



S9007882

石 景 宜 先 生
惠 贈

序

解放以前的兩三年內，寫了一些討論文藝問題的文字，因為性質不同，分作兩輯，一輯叫「文藝書簡」，另一本就是這本「論文學教育」。

北京解放以後，總是在極度忙碌中，印書的事就一直沒有想過。現在雖然出版家肯印這些文字，自己卻覺得已是沒有甚麼必要了。要勉強說出一些理由，那就只能說：這總是一個工作過程，總是一些思想痕迹，即便是在那樣的黑暗統治之下，也還多多少少地做了一點事情，如此而已。

現在翻閱這些文字，發覺過去自己思想中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爲了避免發生麻煩，也難免有些不必要的含糊與刪削。例如「論文學教育」一篇，其中最後曾說：「我們最嚮往的是高爾基所說的：『全人類聯合起來，好像一個家庭，使地球變成他們優良的住所，』然而，以今天的情勢而論，那恐怕還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因爲

那些專以壓迫人，剝削人爲生存條件的敗類還存在着。」這樣的說法，也許正說明了過去自己對於敵人的力量估得太高，而低估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於是把那個理想看得非常遙遠。又，「詩與朗誦詩」一篇，本是一次文藝晚會的講稿，其中所舉「他們在控訴我」一例，曾請一位長於朗誦的朋友當場朗誦，在羣衆中間發生了很好的激發作用。但當這篇文章拿出去發表的時候，爲小心起見，負責編輯的朋友卻把這首詩的大部分都刪掉了，現在我又把它補了進去。

把一些零星文字集合起來給它一個總名，是很困難的，名之曰「論文學教育」，只是因爲其中有此一篇，但也希望它能大致說明這些文字的性質。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

目次

序·····	一
人的改造和文藝方向·····	一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一一
論文學教育·····	二三
文學的價值·····	三七
作家與作品·····	四九
人民文學和世界文學·····	五九
論怎樣打開一條生路·····	六七
詩與朗誦詩·····	七五
馬凡陀的山歌·····	八九

再論馬凡陀的山歌·····	九七
兩種小說·····	一〇五
一種劇·····	一一三
歷史的悲劇和人的悲劇·····	一二五
醫學與文學·····	一三一
最完整的人格·····	一四三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	一六一
紀念魯迅·····	一七三
魯迅的思想和創作·····	一八一
魯迅和聞一多·····	一九五

人的改造與文藝方向

——給抗戰期間留在淪陷區裏的朋友們

抗戰八年，使我們分隔入兩個世界。其初，間接或直接地還可以通些消息，後來就各如石沉大海，很難聽到甚麼動靜。復員歸來之後，有意無意地遇到很多舊友，乍一相見，是一陣驚愕，略略敘談，於是又復歸於平靜，甚至是相對默默，不知從何說起。八年——其實還不只八年——是一個頗長的時間，在這八年中大家所過的都是非常痛苦的生活，古人說，「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這期間可能使一個青年人步入中年，也可能使一個中年人步入老年，在年齡方面或並不如此，而在各人情緒與生活興致上則可能與此接近，而最難掩飾的還有各人臉上的綢紋與鬚髭，雖然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而意外相逢則可能喊一聲：「唉呀，簡直不認得我了！」然而你到底還是你，我也到底還是我，於是也並無稀奇，但即當此時，也許

兩人中間隱隱似隔一道流水，而流水之上還可能騰起一片輕霧，正是「似曾相識」而實際上卻是「不見廬山真面目」，即便一句話拋過了八九年，自以爲靈魂已通，可以接火，然而幾星火花之後卻仍是一抹黑暗。這時候大概就不能不慨嘆：「變了，大大地變了，面貌的改變較易見，而靈魂或思想的改變卻不是可以一照便透的。」

「逝者如斯夫！」一切都在變。而當全世界都陷在戰亂中的時候就更變得厲害。從全世界看，這期間曾經有多少國家被滅亡，有多少國家稱霸稱強，然而曾幾何時，站起來的倒下去，倒下去的又站了起來，這情形實在比「滄海桑田」尤足怵目驚心。就我們自己的國家而論，有一個時候也幾於滅亡，有一個時候也可以躋入強大之林，現在你說她「勝利了」也好，你說她「和平了」也好，或者你認真就說她甚麼也不是都可以，但千百萬生靈被犧牲，無數的財產被毀壞，這卻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從血與火裏逃生，看着無邊的苦難，抱着或大或小的理想而終於活到了今天的人們，試問他又怎能不變？自己生活變，思想變，對於人類歷史的看法也變

了，對於人生的看法也變了，對於人類的將來，國家的將來，以及自己的將來，都有了新的估定，新的道路，而這，也就是多少年來我們時常說到的「人的改造」問題，這種「人的改造」，自然也包括我們文藝工作者在內。平日我們常說，詩人是一個民族的心，或說詩人是時代的先驅或預言者，無論是先驅也罷，預言者也罷，一切總都是現實的發展和進步的結果，但只有那有意識地去克服了個人生命中那些盤根錯節的障礙，主動地去改造了自己的生活與思想的人，才能去改造現實，推動時代。——這裏請允許我打一個話岔，舉一個實例，就如聞一多先生，他本來是一個純粹詩人，是一個埋頭伏案的學者，然而他終於變成一個民主戰士，不料也竟以此而遭犧牲，我們覺得這太可惜了，但「可惜」二字又如何能與聞先生的偉大生命相稱——這樣的人，是我們這時代的典範，這樣的人也就說明了這時代的高度變化，至於懶惰軟弱的人就只好被動地或無意識地在後面邁着蹣跚的脚步，而頑固不化的人就寧肯與時代相違抗，且以自己的落後爲有定見，以自己的糊塗爲聰明無比。

從根本上着眼，如以爲這一次抗戰以及世界大戰只是一種軍事行動，或只看作

一些國際政治糾紛，那是不對的，因為這乃是一個整個世界文化的問題，是一個時代思潮的問題，當然，這一文化或思想的問題又自有其歷史的、經濟的、社會的諸根源，而這表現在文藝上便是創作的主题問題，跟着文化思潮的變化，文藝的主题當然也得變化，這中間當然是有作家的人的變化，或仍曰「人的改造」。思想有正確與不正確，一如戰爭中有義師與不義之師，而在文學世界中也同樣有個分野。若干年來，而且至今還正在發展着的文藝的主導方向是怎樣的呢？我願意用簡單的符號，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第一、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這是一個集體的時代，而不是個人的時代，這時候只一味抒寫個人的作品顯得極不重要。至於不寫「個人」，甚至連「人」或「人性」也不寫，而只寫自然界多麼美好，神靈多麼偉大之類，不但是不重要的，而且是不應當的，因為他對於大多數人的苦難與願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故弄虛玄，叫人家拜倒於自然或神靈，那不是麻木就是別有用心。但所謂表現集體或為大多數人的苦難與願望而寫作，卻並不是絕對不要個人，因為集體到底還是為個人所

集成，而問題只在於個人能不能和集體相感應，假如是的，那麼個人的問題只應在集體中消解而得到解決。

第二、是苦鬪的，而非閒逸的。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是痛苦的，所謂快樂者也只是克服了痛苦以後的快樂，而每當戰爭或革命期間大多數人的痛苦尤甚於平時。這時候的作家如一味地表現閒逸生活，就顯得很不重要，若是眼看着大多數人的受苦受難，或爲了理想而拚死掙扎，自己卻只在個人的閒逸中陶然自醉，那不但重要而且也不應該。與此相連的，過去有些作家除了在其作品中散佈他的多愁善感神經衰弱以外，簡直無話可說，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理睬你的可憐相，現在是一個苦鬪的時代，我們所需要的是健康與強毅，而不是衰萎與頹廢。

第三、是前進的，而非後退的。歷史的發展自有其科學的法則，而創造歷史的總是人，所以人類察往知來，既確信歷史是進步的，又必須盡上自己主觀能動的力量去推動。但人類歷史又是曲線前進的，總的方向是向前走，有時也難免暫時地倒退，那正是因爲：在人類中有一部分人——或某一個集體——在努力把人類生活拉

向合理的，自由幸福的道路去，而另有一部分糊塗自私的人卻走着相反的道路，只想把人類的生活扭回古老的方式，使人類陷於貧困和痛苦。這兩種力量的鬭爭結果就是一個歷史的階段。這一次世界大戰，包括中國抗戰在內，以及中國所謂「勝利」以後的種種糾紛，都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進步呢？還是後退？應該站在哪一方面？應該寫甚麼並怎麼寫？這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應當有認識而知所去取的。一味地發思古之幽情，對於暴虐勢力有意無意或直接間接地爲之鼓吹或辯護者，不但當時的讀者會給他以應得的估價，即將來在歷史上清算起來他也將對於善良的廣大人羣負了道義上的債務。

其實這些話在多少年來已是老生常談，似乎沒有提說的必要，我今天之所以對文藝的舊友們提到這些，也是由於歸來後所見所感而引起的。我只在說明八九年的時間實在不能算短，在這期間甚麼都有很大的變化，就以文藝方面而論，這八九年也不能以一大空白視之，假設有人認爲是一大空白，彷彿說今年秋天恰可以和八九年前的秋天連接起來，或以爲今年落的還是八九年前的秋葉，今年黃的還是八九年前

的秋草，那當然是錯的，與其如此，還不如承認自己是被迫缺課，假如可能，假如有興致，似乎應當做一點補課的工夫。但是，我的話實在很使自己擔心，我怕朋友們看了這段話要見怪，說我狂妄自大，把抗戰期間留在淪陷區裏的朋友們的不得已和苦痛完全抹煞了。假設如此，那就完全錯誤，我的意思恰恰與此相反。上面我所說的那個八九年的大空白，留在淪陷區裏的朋友們就是用了不得已和痛苦把它填滿了的。我們剛剛見面時，總聽到朋友說：「你們在後方的人這些年來真夠苦了！」誠然，我們也苦，衣不暖，食不飽，教育着人家的子女而自己的子女卻繳不起學費，活在自己的國內卻不准對自己的國事特別關心……這當然很苦，然而，你們所受的苦恐將十倍於我們，百倍於我們。當我還不會回來的時候，一個早已回來的朋友曾寫信告訴我：「這裏表面上很少變化，有些舊街道和舊建築還和戰前一模一樣，假如說有變化，那倒是添了一些新建築，有些園林顯得更濃密，有些樹木顯得更高大了。但一接觸到人，一接觸到人的思想、精神、或靈魂的時候，那就叫你另有一種感覺，你總覺得有一個魔影似的東西在你意識中蕩來蕩去，但這不能怪我們

自己的同胞，實在是異族長期統治的結果。」我讀到這信時還並無甚麼感觸，等我自己回來後我才漸漸地明白了。我很同情不得已而留在淪陷區的朋友，我也深深地瞭解他們的痛苦。（當然，那些假借「不得已」的招牌而在敵偽統治期間曾經作過某種活動的就不在此內，此刻他們假如在良心上或顏面上覺得有一點兒難堪，那就是活該。）至於身受了這種敵偽統治的痛苦而居然不覺其爲痛苦的人，那當然也就更可哀，也許那是已經無可如何的了。因此，就我自己想到的，也是同朋友們談過的，我提出以下三個希望：

第一、抗戰期間留在淪陷區裏的朋友們，應當盡可能地重新來理解這八九年的世界友勢以及中國長期抗戰的情形，尤其應當理解的是這些年來的文化思潮。從事於文藝工作的朋友們，當然還要理解一番這些年來的文藝思潮。有多少重要的文藝問題以及比較重要的著作或翻譯，都應當盡可能地看看，即使興趣並不太高，也似乎應當勉強看看。

第二、我們出去跑了這麼多年，沒有作出什麼成績，空手歸來，自己自然覺得

慚愧，但我們卻還希望這邊朋友們能有些作品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在淪陷期間，有人一個字也不寫，有人寫了卻不能發表，現在，應當把從前不敢寫，不能寫的都寫出來，寫敵偽的橫暴，寫人民的痛苦，寫知識分子在黑暗中所受的種種折磨，可寫的東西太多了，尤其是地下工作者的情形，以及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和敵偽暗中苦鬥的烈績，都應該寫出來。在黑暗中身受過痛苦的作家朋友們，寫這一方面的作品一定可以寫得好，在一年半載之內，一定可以有傑出的作品拿出來。

第三、我希望我們從後方復員回來的人們，也要盡可能地瞭解淪陷區的一切情形，並瞭解這邊的朋友們，因此也就希望這邊的朋友們要盡可能地讓我們瞭解。我們歸來以後，其初我們的心是敞着的，我們的口也是敞着的，但不知爲了甚麼，先是我們的口閉了起來，漸漸地我們的心也閉了起來，其初，我們的感覺是回家的感覺，後來卻又漸漸變成異鄉異地的感覺了。這情形很不好，這使我們大家互相保留，惟恐一語不慎，便傷着對方的尊嚴，我們既然如此，又怎麼能憑藉了文藝工作者及其作品去瞭解整個社會，以及廣大羣衆在敵偽統治下所受的痛苦？

爲了大多數人的苦難與願望，爲了各方面的，自然也包括文藝的進步，願我們文藝界的新舊朋友們，認識多少年來一直在發展着的文化思潮和文藝思潮，並願以上的三個希望作爲我們大家的希望，這些希望的實現，對於當前的文藝工作，以及當前我們這個奇怪民族所遭遇到的最大難題，可能都有益處，對於一個合理的將來，也可能盡一點催生的力量。秋色正濃，天氣漸寒，我們是從一個熱烘烘的地方跑回來的，這裏的冷空氣和藍天空先既使我們心頭沉默，口頭瘖啞，同時也使我們頭腦冷靜，思想澄澈，但願我這些話不致於太糊塗，但願我這些忠言不致於傷害任何何人，更願意不至違犯到任何忌諱，在這個到處充滿了忌諱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無論什麼運動，都在由多數人的共同認識與力量所造形的，文學運動當然也是如此。而文學創作，卻似乎只是作家個人的工作。我們現在把文學運動和文學創作相提並論，就是要說明二者的相互關係。

文學運動，實際上也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運動，因為文學運動乃是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或者是文化運動的一個形態。而文化運動實在是一個時代的思想運動，所以文學運動也仍以思想運動為其根基。從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看，也分明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文化運動，這一運動之所以起來，自有其國際的與國內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諸種原因。在這一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導思想，是民主與科學，即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之所以要求民主，是因為舊文化的不民主；其所以要求